

阿伦特的“行动”理论探析

周 姣

(中国政法大学 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北京 100088)

摘 要:在阿伦特的思想中,“行动”是作为人之境况的最能体现人的价值的一部分,也是其主张积极自由的理论前提。分析阿伦特思想中的人之境况的三部分:劳动、工作与行动,探析行动空间——公共领域,包括公私领域的划分,行动在公共领域中的特性,及现代公共领域的衰落。基于行动理论,对阿伦特推崇的参与式民主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阿伦特;政治思想;行动理论;公共领域;参与式民主

中图分类号:D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494(2012)03-0043-04

阿伦特是20世纪杰出的思想家。她的政治思想以具有原创性著称,至今人们试图对其思想进行流派的界定大多以失败告终。一方面,是因为阿伦特思想独具一格,她的著作并未按照传统的学术要求对各种概念进行严格的界定,人们对其思想争议性比较大。另一方面是因为阿伦特思想线索繁多,且相互交织在一起。任何对其思想的界定必然会导致部分思想的流失。但总的来说,阿伦特推崇古希腊城邦时期的直接民主,强调政治、行动的尊严。“行动”概念是阿伦特思想中最具原创性的部分,体现出阿伦特对人、对政治、对公共领域等概念的把握。

一、积极生活与“行动”概念的提出

在阿伦特的思想中,“积极生活”是哲学“沉思活动”中的一种“不宁静状态”。积极生活主要包括三种:劳动、工作和行动。在古希腊时期,沉思活动具有内在优越性,它不但要求人们摆脱生命必需性和脱离他人的强制,哲学家们又加上了免于政治活动的自由,寻求绝对的宁静状态^[16]。而只有劳动和工作的生活在古希腊时期并不被视为完整意义上的生活,因为它们不够有尊严。以现代的观点看来,“积极生活”恰恰意味着不宁静。尽管各类活动背后的关切不一样,但这种对“积极生活”的关切程度不高于、也不低于对“沉思生活”的主要关切。

(一)劳动

劳动是指人身体的生物过程相应的活动,身体自发的生长、新陈代谢和最终的衰亡,都要依靠劳动产出

和输入生命过程的生存必需品。劳动的认人之境况是生命本身^[11]。在阿伦特看来,一方面劳动是维持生命不可或缺的,与人的生命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劳动又依赖于自然,并被生命的必需性和必然性所限制。正因为劳动受制于生命,阿伦特虽然不像古希腊人们一样对劳动充满了蔑视之情,但是她也认为不应该提倡劳动。劳动并不能对人的存在给予更高的肯定,它的作用仅仅在于满足人的生命需求。阿伦特甚至称,沉迷于劳动的满足之中的人只能是未脱离动物性的“动物化劳动者”,“动物化劳动者其实是动物的一种,至多不过是最高级的动物而已”^[126]。

劳动动物具有无世界性,它内在对世界公共性主动逃离。劳动动物始终封闭在自身身体的私人性中,满足生命必需性,繁殖后代。劳动不需要与他人进行分享和交流,这种程度上说,劳动不是逃离世界,而是被抛弃世界的^[19]。劳动为人之境况所必须,但却不足以进入人的政治领域。

(二)工作

工作是人存在的非自然性相应的活动,即人的存在既不包含在物种周而复始的生命循环内,它的有死性也不能由物种的生命循环来补偿。劳动所提供的世界为生命必需性服务,是短暂的、即时的、消费性的世界。但工作为人类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自然环境的“人造”的、物化的世界,具有持存性。工作的人之境况是世界性^[14]。

在工作领域内的技艺人通过制作实现对世界的物化。技艺人通过暴力的方式从自然界中夺取材料,对其

收稿日期:2012-03-28

作者简介:周 姣(1981-),女,湖南宁乡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文化传统与政治现代化。

加工制成相应的成品。他们视自己为整个地球的统治者和主人,通过技艺人的眼睛看世界只有一个特征,即“有用性”。不同于劳动处在需求、生产、消费的无休止循环之中,工作(制造)活动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它始终存在于“目的——手段”的链条中。对每一件成品来说,产品是其最终的目的,工具是实现目的的手段。由于工作具有目的性,故可以通过实现目的来证明手段的合理,由此,在工作领域暴力具有合法性。

(三)行动

阿伦特的“行动”直接来自亚里士多德的实践。它不同于具有目的性的生产活动,“良好的实践本身就是目的”。行动,是唯一不需要以物或事为中介的,直接在人们之间进行的活动,相应于复数性的人之境况^[1]。这句话表明行动最基本的两种特性,一是行动具有彰显性,二是行动具有复数性。

行动具有彰显性是指,人们可以通过言说和行动来体现自身独特的差异性,由此将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行动没有明确的目标,它以自身为目的,力求在行动中展现自己的独特性。通过彰显自身的独特,行动充分向他人展示我是“谁”而非我是“什么”。行动具有复数性,是指在行动领域中,行动需要他人的在场。在劳动和制作领域,人们不需要相互往来,即使在孤独状态下,也可以各自完成任务。但是在孤独的情境之中,行动无法展开交往。行动的复数性是形成公共领域的必要条件。由此,行动是具有积极性的,建立在主动性的基础之上,它不是那种某人可以放弃也仍不失为人的主动性^[138]。

阿伦特以“行动”作为人存在的最完整的条件。人们通过自己的言行充分与他人区别开来,它充分体现了人的利益、尊严和个体价值。而在劳动领域中为生命必需性所限的劳动者,和在制作领域被功利性所驱使的技艺者,都只是“为欲望而生存的人”,我们无法期盼这些人去实现政治上的自由追求。只有那些个人价值、利益得到充分实现的“行动者”才能在多样性的世界当中成为“需求已经得到满足的人”,成为政治存在的依靠^[139]。

二、行动的空间:公共领域

(一)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

阿伦特从古希腊的政治经验中,区分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概念。在古希腊,人类活动的基本场所所有两种:家庭和城邦。在家庭中,人们为维持生计和延续后代而不断劳作,无法逃离生活必需性的支配,这些人不参与城邦事务中来,也不关心伟大、卓越和不朽。这属于私人领域。与城邦相对应的是公共领域,即政治

领域。在政治领域中,人们暂时抛开生命必需性的限制,通过言说和行动投入到城邦事务中去。只有在政治领域中,人作为“政治动物”的价值才得到体现。在阿伦特看来,劳动的目的是维持生命,生命是劳动动物的最高价值。劳动和工作都是人类在自然环境中采取的活动模式。而行动实际上是人类之间的互动关系。在正常状况下,前两者基本属于私人领域,而行动属于公共领域。

阿伦特认为,只有行动才能充分体现人的价值。在公共领域中的言行都能被在场的人见闻,人们也可以通过言行直接参与公共事务,政治是人们在突破生命必需性和目的性之后的产物,是人类高度文明的表现。阿伦特认为,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应各司其职,不能混淆。纯粹的个人感情和经济利益与公共精神是相违背的,它们都受制于必然性,既无法与别人进行分享,也不可能自由显现,阿伦特并非否定私人感情和经济利益,而是认为它们不适合出现在公共领域。

(二)公共领域中行动的特性

阿伦特把个人通过言说和行动参与至公共事务中视为人的第二次出生,它意味着创新和开始(因为希腊词 *archein* 最早表示“创始”“引导”)。人们通过言说和行动在公共领域中彰显自己,让自己切入世界。阿伦特认为,行动如果不具有开端性,我们将被束缚于自然规律之中。如果永远顺其自然,人类事务就只能遵从必死的规律。正是行动打破了这种规律,它使人们具有创造奇迹的能力,开启新事物的能力,将世界和人类事务领域从“自然”的毁灭中拯救出来。

每个人都具有开启新端的能力,同时,由于行动依赖于他人的在场,每个开端又必然将他人卷入其中,由此构成了人类事务领域中的人际关系网络。由于这个业已存在的人类关系之网包含着无数相互冲突的意志和愿望,所以行动从来都达不到它的目标^[144]。行动因而具有三个特征:行动过程的不可逆转性、结局的不确定性及不可预测性。人们具有开启新端能力,却无法掌控事件的发展方向。对于已经发生的事情,人类也无力改变。阿伦特批评了现实政治中人们自以为能掌控一切人类事务的思想倾向。

行动具有过程性特征,它以本身的实践为目的。对此,阿伦特提出分别通过“宽恕”和“承诺”来解除行动的不可逆转性和不可预见性。人们通过相互承诺和相互约定,在众人之间建立一个共同意志的目标,部分地驱除未来的不可预见性。但是,宽恕和承诺的权力只会对部分事务有效,人类不能企图通过宽恕和承诺消除人类事务所有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况且,人类根本无法对未来全部做出限定,而这正是极权主义所力求的。

(三)世界的异化——公共领域的衰落

1. 社会领域的兴起

阿伦特主张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严格划分。但是在近代,随着家务管理及其活动、问题和组织化设计等从被遮蔽的家庭内部浮现出来,进入公共领域之后,不仅模糊了私人和政治之间的古老界限,同时也改变了他们对于个人和公民生活的意义^[124]。随着社会的兴起,随着家庭和家务活动进入公共领域,古老的政治和私人领域以及更晚近建立的私密空间不可抗拒地被吞噬的倾向,已经变成了社会这个新领域的典型特征之一^[125]。当整个社会被生命必需性所制的劳动统治时,个人的言行、特性,彰显、卓越和不朽都退居幕后了。劳动快速崛起的社会领域几乎把所有人都变成了劳动者。“重要的是社会在它所有方面都排除了行动的可能性,而在先前,行动只是从家庭中被排除了出去”^[126]。

2. 原子式个人的出现

阿伦特坚持认为公共领域应该是行动的公民在公共生活中的自我展现、共同商讨公共事务从而获得自由的意义空间。但是在现代社会领域中,劳动占据了统治地位。言行在劳动领域中是无意义的。现代社会中的个人具有高度的同一性、平面性,否定了人与人之间的区别,成为了原子式的个人。

原子式的个人对公共领域漠不关心,人与人之间缺少正常交往、不关心政治、拼命追求物质满足,成为受消费社会严密组织的机器^[125]。因为失去了令生活有意义的共同世界,他们既不能反思事务,也不能反思自身,全无经验能力和思考能力。即无法通过言行进入政治领域,实现个人的卓越。极权主义正是建立在由纯粹原子化的个人组成的大众之上的。极权主义的一大特点就是要把人塑造成整齐划一、无个性思想的齿轮式的人物。“极权主义运动谎称要消除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分离”^[1469]。事实上,正是极权统治对公共领域造成了极大的侵害,甚至消解了公共领域的存在,它对真正关心公共事务的有责任心的公民是完全排斥的。

3. 世界的倒转

在公共领域中,行动的过程不可逆转性,结果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见性,导致了人类事务的脆弱。也正是出于对行动带来的脆弱性的恐惧,使得渴望确定性的人类往往试图用目的明确的工作替代之,制作领域渗入至公共领域之中。行动在现代的几近全面的丧失正说明这一企图的实现。这一现象并非在近代才出现,从远古的古希腊政治开始,人们就有这种倾向。

柏拉图把理念描述为“最明亮”的东西,美的变化形态。而这种理念一旦运用至城邦之中,理念转化成为

了标准——“善”,暗示了“有益于”或“适合”的意义,具有了目的性。哲学家从洞外返回洞穴之内后,把理念转化为标准和规则来引导、衡量人们的言行,用一种绝对的、客观的确定性标准统一起来。哲学家运用理念正如工匠运用他的规则 and 标准,他像雕刻家制作一个雕像一样“制作”他的城邦^[1176]。工作领域侵入至公共领域之中。柏拉图的“知”与“行”的分离在近代演变成了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区分,通过把行动解释为制造和制作,强化了对行动的替代。这种制作对行动的代替带来两重危险,其一这样的思想迫使人们承认,一切手段只要有效,就是有效的。暴力因素因此也被蕴含在内。其二在于以制作代替行动,等于把政治贬低为达到一个目的的手段。政治的意义不再在于本身。

然而,制作侵入公共领域并不意味着技艺人的胜利,我们现今的社会,是一个劳动动物胜利的社会。与古代追求精神和沉思的永恒与不朽不同,近代社会通过马克思等人的宣传,劳动成为了人最高贵的活动,尘世的生命成为了人的最高善。劳动的解放和社会化,使整个社会陷于巨大的生产和消费之中(劳动的产品为人的生命必需性所服务,无法储存,只能不断消费)。在这种单纯的生产和消费领域之中,人处于孤独的境地,人的独特性也并不需要得到彰显,只是单纯的种族的繁衍。“公共领域”崩溃了。行动的可能性也被排除了,人们陷入消极的生活之中。

三、行动的积极作用:参与式民主

(一)参与式民主的兴起

“参与”在传统民主思想中一直居于核心地位。古代雅典的民主制度即建立在公民大会的直接表决和全民参与的基础之上。但是这种直接民主在历史上的实验并不长久,由于其形式上激进的特点被民主理论弃置在了一旁。后古典时期精英主义的民主思想占据主导地位,近代,代议制民主成为了西方主流民主形式。对于民主的认识,熊彼特说:“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决定而做出的制度安排,其方式就是通过竞选人民的选票来获得做出政治决定的权力。”^[1359,370]在现代,民主成为了一种制度安排,达尔认为,民主的两个关键要素是竞争和参与。但是,在现代代议制的民主形式之下,民众的参与已不是人民参与政治决策,而是选民参加竞选投票来选择自己的领导人^[164]。自由主义民主所主张的“民主政治”也不过是一个神话。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西方普遍爆发了大规模的社会动乱或政治危机集中体现了代议制民主的深刻危机。公众采取游行、示威、抗议等行动,建立各种组织,揭露

西方民主政治的虚伪、腐败等种种弊端。人们不满于参加有限的、形式上的民主,要求直接参与民主,参与经济管理。这说明民主的程序并不能代替民主的实质。

民主的本质是公民参与政治,也是参与式民主的核心理念。在卢梭的原初含义中,民主意味着“与所有人有关的事务应该由所有人来决定”。参与式民主思想的发展和丰富有一个漫长的过程,1960年阿德诺·考夫曼首次提出“参与民主”概念,随即广泛运用于社会各个领域。但是,最初参与式民主理论主要集中于校园活动、学生运动、工作场所、社区管理等社会民主领域,并没有上升到政治生活和国家层面。1970年,卡罗尔·佩特曼的《参与和民主理论》一书的出版,才标志着参与式民主理论的正式出现。作为一种民主模式,参与式民主可以理解为:普通公民应该参与影响他们工作和生活的决策过程^[7]。

(二)阿伦特思想中的参与式民主

阿伦特的政治观被称为“古典共和主义”的政治观,推崇古希腊城邦时期的公民普遍政治参与行为。阿伦特也批判代议制民主,她认为现代代议制实际上在很多方面已经不再允许公民的实际参与,由于政党体制的弊端,出现了官僚机构化的倾向。“这使得它们除了党派机器以外,不代表任何人”^[8]。针对这种情况,阿伦特尤其强调公民的政治参与,提倡公民不服从的重要性,主张积极性的自由。

对于参与式民主,阿伦特寄望于类似古罗马共和政体的议会体系。这种议会体系是自发的,追求对公共生活的肯定,强调对政治的承认与民主的参与。人们通过言行参与至公共事务中去。这种参与的形式可以是多样的,不仅限于国家大事,可以在社区、学校或工作场所等。人们通过开放、自由、充分的讨论,自然而然地形成政治意见的领袖。阿伦特相信人是政治的动物,“而其政治性则在于人能够通过言行,与他人互动。有言之行则构成人类活动生命形态中最高贵、最有价值的

一种表现形式,使人可以超越汲汲营营的自然限制而臻于不朽”^[9]。公民应当是政治共同体的积极成员,公民的性质不仅是一种政治共同体成员的身份,更是一种作用和力量,自由个体以此而在民主共同体事务中成为有效成员^[10]。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在阿伦特的心目中真正而完善的人不是原子式的、孤立的、对“公共领域”漠不关心的人,而是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在“行动”中实现自我的人。阿伦特是一位重视“积极自由”基于“消极自由”的理论家,她最为关心的也是政治参与与公民的积极性。在公共领域中注重积极公民的恢复和培养,也是当今我们民主政治建设的内在要求。

参考文献:

- [1]汉娜·阿伦特.人的境况[M].王寅丽,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 [2]蔡英文.政治实践与公共空间:阿伦特的政治思想[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 [3]邹晓莉.公共领域与生活方式[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7.
- [4]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M].林骧华,译.台北:台北时报出版公司,1995.
- [5]熊彼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 [6]晋振华.当代西方参与式民主评析[D].苏州:苏州大学,2007.
- [7]王寅丽,陈君华.浮上水面的潜流——汉娜·阿伦特公共领域的衰弱[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6):17-21.
- [8]何怀宏.西方公民不服从的传统[M].吉林: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
- [9]江宜桦.自由民主的理路[M].北京:新星出版社,2006.
- [10]王寅丽.在哲学与政治之间:汉娜·阿伦特政治哲学研究[D].上海:复旦大学,2006.

On Arendt's Theory of "Action"

Zhou Jiao

(Politics and Public Administration College,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analyze Arendt's theory of "action" briefly. According to Arendt's theory, "Action" manifests person's value, and is the basis theory of pursuing "Vita Activa". First part in this text describes the basic three human conditions: labor, work and action. The second part introduces the public realm in detail, including analyze the division of the public and the private realm, features of action in public and decline of the public realm in modern. The last part i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participatory democracy which is promoted by Arendt.

Key words: Arendt; political idea; Theory of Action; public realm; participatory democracy